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论 文】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¹

何星亮¹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标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 2000 多年统一和完整，与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具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古代中国 民族分类 民族认同 文化

世界历史上民族或族群分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按血缘来划分，民族身份以父母血缘来决定；一种是按种族来划分。西方国家多采用这种方式，如希特勒鼓吹种族优劣论，并按种族优劣对世界各国民族进行分类。20 世纪以来，部分国家实行种族隔离制，根据人种的不同（如白种与黑种）分成不同的人群，并制定相关的法规，区别对待不同种族。三是按文化来划分，如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和民族认同的标准既不是血缘，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 5000 多年而不衰，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数千年的统一和完整，与以文化作为民族分类和民族认同的方式密切相关。这种分类和认同方式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有利于不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本文主要以古代中国的民族分类与认同作一探讨，说明它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长期保持统一的关系。

一、文化：古代民族分类的标准。

古代中国的民族或族群的分类标准与西方不同，不是血缘和种族，而是文化。古代华夏人与周边族群的区分，主要是以文化作为区分的标准。先秦时期中国的族群有中原华夏和周边的戎、狄、蛮、夷的区分，《礼记·王制》篇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古代的所谓五方之民的区别，主要是饮食、习俗和语言等方面的不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

¹ 本文刊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20-25 页。



以文化作为分类的标准，并把古代中国人分为两大类：一是居住在中原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人；二是在住在中原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群。由于中原的华夏文明水平较高，因而成为古代中国的文明中心，并逐渐形成以文化礼俗为标准的群群分类的标准。与华夏礼俗和伦理道德相同或相似的族群，便是华夏人或中国人；与华夏礼俗和价值观不同的，就是四方之民。历史文献中常出现的所谓“夷夏之辨”，是古代中国在民族或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而“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血缘、体质等方面的差别，而是指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差别。认同并采用华夏礼俗和伦理道德的，不管他是中原人还是边疆之民，都被视为华夏之人；认同并采用边疆地区的戎、狄、蛮、夷礼俗和价值观的，即使他原是中原人，也一样被视为非华夏人，而是拥有该文化的某族之一。例如，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为夏后氏之裔。这并不是全部匈奴人都是夏后氏的后代，而是匈奴的统治者是夏后的后代。商灭夏后，夏王族部落往北迁徙至漠北草原，并与当地的游牧民族融合，由于夏王族部落文化水平高，成为漠北游牧民族匈奴的统治者。²后因夏王族部落人数较少，采用匈奴的礼俗和伦理道德，融入匈奴。不过，他们还保护夏王室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所以史籍记载有匈奴崇龙习俗。又如南北朝时的桓诞，为桓玄之子，原是安徽怀远（谯国龙亢）的汉人。桓玄被诛后，他流亡到大阳蛮中，入乡随俗，采用蛮族的文化习俗，并以足智多谋而成为群蛮首领，拥有八万余落部众，后来依附北魏孝文帝，受封襄阳王。³

古代民族以文化分类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密切相关。章太炎曾在1907年的《民报》上刊文，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他说，“中华”这一名称既非地理的名称，也不是种族的名称，而是文化的名称，无论是什么地方的人。族群的区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血缘或地理。数千年来，数千百族群融合于中华，并形成中华民族。⁴当代一些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是“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而不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文化价值和伦理道德被用作族群分类的标准。中国历史虽然历经较为频繁的朝代更替，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清末。因此，近代之前的中国是具有一个独特的文明体国家。⁵

著名古史学专家杨树达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分类方式，他在《论语疏证·八佾》中说：孔子不以血缘种族作为四夷和华夏的区别，而是以行为规范和礼俗作为分类的标准。2000多年前的孔子，好像预测到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种族主义者以种族优劣而祸害天下一样。所以，以文化来区分族群的方法是极具智慧和远见卓识的。⁶

二、古代民族认同的特点：变异性。

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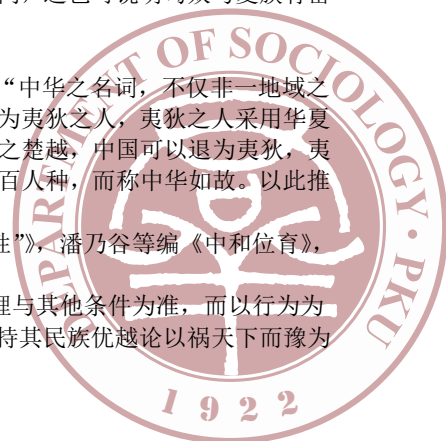
²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夏王朝亡国之后，夏桀之子率领王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由于文化水平高，成为漠北的统治者，是完全有可能的。史籍又记匈奴崇龙、尚左等习俗，与夏族习俗相同，这也可说明匈奴与夏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³ 《魏书·蛮传》卷101。

⁴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种名。华夏之人采用夷狄文化便成为夷狄之人，夷狄之人采用华夏文化便成为华夏之人。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

⁵ 参看金耀基：《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潘乃谷等编《中和位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4页。

⁶ 杨树达在《论语疏证·八佾》中说：“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认同是自由的，民族身份可以随时改变。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专门划分族群的“民族识别”，选择何种族群作为自己的族属，不以血缘或历史，而是以文化为标准；不是以强制的方式，而是自由选择。认同哪一个民族的习俗和规范，您就属于该民族；如果改用另一个民族的习俗和礼仪，您的民族属性也随之改变。

唐朝思想家和政治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¹这句话的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华夏之人如果进入了边疆地区，并采用边疆地区的文化习俗和伦理道德，便成为夷狄之人。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夷狄之人如果到了中原地区，采用华夏礼俗和行为规范，便成为华夏之人。这是春秋时期的族群认同的基本原则。

唐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程晏归纳综合了历史上族属改变完全在于文化认同，他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窞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²程晏所言，说明一个人和一个群体或为“华夏”或为“蛮夷”，其主要根据是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而文化和心理认同是可以变化的，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认同的变化。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个人或者某群体都可从蛮夷变为华夏，也可以从华夏变为蛮夷。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华夏之民，“反窞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 23 年曾与兵部尚书李靖就夷汉关系问题进行过极具理论意义的对话：“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鬪。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³李靖所言大意是：人生下来并没有民族的分别，民族区分的原因在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原为河北景县（渤海调蓳）的汉人，后其祖父因犯法而迁徙到鲜卑人居住地区的怀朔（包头市东北），成为鲜卑化的汉人。史称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遵同鲜卑”。⁴高欢不仅入乡随俗，而且改用鲜卑人名字，取名“贺六浑”，而且还娶了鲜卑贵族出身的妻子。高欢曾掌东魏兵权，称大丞相，其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北齐，追谥高欢为神武帝。

大量史实表明，变异性是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什么朝代，都承认个人的“族性”具有可变性。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族属固定在某一民族之中，从来没有认为个人的“族性”是不可变的。

三、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与中华民族。

（一）以文化作为民族分类和认同的方式促成中华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的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是分不开的。以文化作为分类和认同的标准，使不同文化的族群由淡漠隔阂走向自然融合。古代民族认同的变异性，促使各民族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静止不变的。由于古代民族的划分仅仅是粗略的区域划分，而且

¹ [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

² 程晏：《内夷檄》，载[宋]姚铉编：《唐文粹》卷四十九。

³ 《李衛公問對》卷中

⁴ 《北史·齐本紀》上，卷 6。



这种划分随着民族的交融而不断变化，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把民族身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它促使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流交往交融，在文化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使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使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不可分的整体。

众所周知，民族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十分很重要的作用。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至鸦片战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各民族不断整合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互动频繁，迁徙不息，其结果，一方面是导致民族融合，大量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另一方面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的整体。

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至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互动、大整合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阶段。炎帝和黄帝集团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与东夷、苗蛮、西戎等民族集团进行着密切的互动、交流与冲突，其结果是炎黄集团融合部分东夷、苗蛮、西戎，并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形成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的大一统，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大互动、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周边的部落或部族，大多都和中原的华夏族有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有些甚至相互通婚，如春秋时的晋国与战国时的燕赵两国，征服和兼并了许多狄人的部族，并与之相互通婚。战国时期的秦国本来是一个西戎和华夏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到秦始皇时代征服了西戎与巴蜀一带的氐羌。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民族。春秋时的吴国也是一个荆吴与华夏人混合居住的地区，而越国原有的居民主要是南方百越民族，后来吴国和越国均先后成为华夏集团的成员。楚国本身就是一个南蛮之邦，后来也加入华夏集团，战国时楚国征服长江流域的荆吴苗蛮与百越。

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民族互动的第三次大迁徙和大融合。秦汉时期，随着版图的进一步扩大，华夏文化不断地向四周幅射和传播，周边民族不断的吸收中原的华夏文化，并不断地融入到华夏民族之中。至汉代，发展成为人口众多、分布地域辽阔的汉民族。从魏晋南北朝的冲突到隋唐的整合，形成第三次民族大互动、大迁徙、大融合的周期，其规模远比前两次大，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最重要的第三个阶段。¹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各民族在文化上取长补短，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在婚姻上相互通婚，北方不少民族与中原人在血缘上逐步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原人为了逃避战乱，举家整族向南方迁徙，形成中原汉人向长江以南大迁徙，最远达两广和福建等地。随着几次的民族迁徙，各民族都在广泛迁徙和互动中交融，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融合，南方少数民族与南迁的中原人融合。直到隋朝统一全国，东西南北的汉文化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又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唐代主张华夷一体，夷夏不分。中原的汉人进一步广泛的吸收了异族成员与异族的文化，从而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规模。

五代十国至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互动、大融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沙陀人（唐代西突厥的一支）、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大批进入中原。而中原汉人也因战乱而再次往南迁徙，并在南方建立了政权。至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奚族、女真（部分）、党项、渤海等都逐渐溶入了汉民族中。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以儒学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为正统文化，并逐渐以中国正统自居，自命是中原的合法继承者。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辽朝后，契丹人大多融入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到了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而内迁的女真人与汉人杂错而居，互为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至元末，大部分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²明清时期是我国第五次民族大互动、大整合时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留在中原的少数民族主动融入汉族，促进了新

¹ 参看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2期。

² 参看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2期。



的民族融合。西北的少数民族也大量迁入汉族地区并与汉人融合。清王朝建立后，不仅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局面。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与汉族上层联合，并采用汉族的制度和他文化，使其逐渐演变成满汉文化。他们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民族交往的措施，加速了汉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历史上每一次大互动、大融合，都加速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每一次融合过后，民族结构的越来越紧密，民族关系越来越和谐，文明素质越来越高。至清末民初，基本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¹

（二）以文化为民族分类标准促成主体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高，其他地区的人便借鉴或采用该地区的技术和文化。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周边民族地区，因而，周边民族地区大量采用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促成周边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趋同，使周边民族逐步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与中原的汉族融为一体，使汉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正如费孝通所说：“汉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它是像“滚雪球”那样滚出来的。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北方和南方的汉族基因差异很大，北方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很接近；南方的汉族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很接近，这也说明大部分汉族都是由古代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²

（三）以文化作为民族分类和认同的方式促使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要向各民族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关于这些，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大量的证据。

首先，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源流的华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创造华夏文化的中原人融入了大量的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秦汉以后，大量的古代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人融合，并把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入中原地区，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当代的中原文化与古代的中原文化完全不同，其原因是融入大量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以来迁入广东等地的客家人，保留了较多的古代中原文化和语言的特征。

其次，通过文化交流，周边各族的文化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自张骞通西域后，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物产，植物有葡萄、苜蓿、蚕豆、胡桃、石榴等十多种，家畜有汗血马等，这些物产的输入，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增加了中原人民的财富。从丝绸之路传入的精神文化产品也很多，如乐器乐曲的传入。在唐代的长安，西域乐舞处于压倒本地乐舞的优势。在开元天宝间，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唐代回纥人的服饰在中原地区也产生重大影响，回纥服饰和梳妆打扮成为中原人的时髦。中唐诗人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由此可见，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可见中原主流文化不专属于汉族而是共属于中国各民族。

第三，周边各民族的文化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由于古代中国的中原文化高于周边民族的文化，因而周边各民族大量采用中原主流文化，例如，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汉传佛教文化都大

¹ 参看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2期。

² 何星亮：《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认同》，《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5日。



量传入周边各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古代中原音乐传入纳西族地区并经过纳西化而成为闻名中外的纳西古乐，畲族文化中吸收了大量的古代中原的道教文化。因此，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因素。满、回、壮、土家、纳西、白等民族采用中原文化的要素更多，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大量借鉴古代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成为许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在历史上也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中原文化。不少学者认为，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学者玉素甫·哈吉甫创作《福乐智慧》（大约成书于1069—1070年间），从结构和内容来看，受《论语》、《大学》的影响很大，在益智增知、养德修善和治国方式等方面，基本上与《论语》、《大学》等经典相同，说明玉素甫·哈吉甫在撰写《福乐智慧》时借鉴了先秦百家诸子思想和言行。古代藏族也吸收大量的中原文化，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后，定都逻娑（今拉萨），始制藏文、藏历，创订法律、度量衡，分设文武各级官职，并引进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吸收了大量的古代中原建筑文化因素。再如明末清初的回族学者，为构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义，从儒家经典中吸收相近、适用的思想和理念，融入到伊斯兰教义学中，并重新注释、理解伊斯兰文化，使回族的伊斯兰教成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¹

第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由有三：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北京话，是吸收许多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基础上形成的。魏晋南北朝以来，周边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使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地区原来使用的汉语在北方完全消失，但保留在古代南迁的中原人中。保留古代中原汉语较多的是客家方言、闽南方言和广州方言等。因此，现在的国家通用语言并不是完全由汉族创造的，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有些学者认为，普通话是满族和汉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是满族学讲北京汉人的明朝官话（吴语）时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汉语，即满式汉语。满式汉语后来通过清政权推广到全国，就成了清政府官话。二是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全国各地交际的语言，而且也是少数民族不同支系或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际语言，如苗族、畲族、瑶族、彝族、傣族、仡佬族等，不同支系、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别很大，无法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大多以普通话进行交流。三是中文是全国大多数民族通用的文字，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中文都是全国各地通话的文字。各地虽然方言差异很大，相互之间难以交流，但文字却是相同的。周边民族地区也一样，虽然语言不同，但中文通行于各民族地区。例如，新疆自汉代以来便开始使用中文和当地民族文字两种文字的钱币。一种称汉佉两体钱，和田古城址曾出土，正面是篆书汉字，背面是佉卢文。²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钱币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两种文字制造的钱币。另一种是汉龟两体钱，在新疆轮台古城出土，铜质，圆形方孔，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古龟兹文。³一般认为，汉佉两体钱的使用年代是汉代至晋代年间。汉龟两体钱使用时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刻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表明古代西域自汉代以来便隶属于中国，并由中原王朝统治；二是说明汉代以来的西域有许多汉人，倘若汉人极少，不可能铸造两种文字的钱币，因铸造钱币是极为复杂的；三是表明自汉代以来，西域就使用“双语”，汉语和当地的民族语言同时使用，汉语是古代西域各地共同交流的语言；四是表明自汉代开始，中文就是古代西域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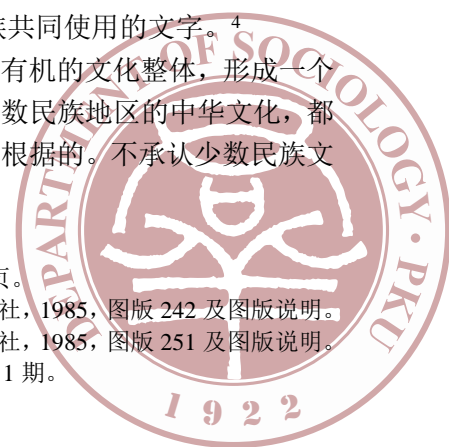
据上，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有机的文化整体，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无论是汉族地区的中华文化，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华文化，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有些人把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站不住脚的。

¹ 秦惠彬：《中国伊斯兰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96-100页。

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图版242及图版说明。

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图版251及图版说明。

⁴ 何星亮：《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一性与互补性》，《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四、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与中国的统一和完整。

（一）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由于古代中原文化远远高于周边地区，使古代少数民族认同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认同炎黄子孙为代表的华夏民族。在古代少数民族中，有些民族说自己是黄帝之裔，有的说是炎帝之裔，有的说是夏后氏之裔，有的说是舜之裔，等等。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说明匈奴人认为自己是夏王族的后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赵国开国皇帝是刘渊（249年至253年之间—31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之后，南匈奴单于于夫罗之孙，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祭祀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拓跋鲜卑是鲜卑的一支，是建立北魏的王族，拓跋鲜卑族也把自己当作黄帝之后裔，《魏书》开篇便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¹《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²这也说明拓跋鲜卑认同黄帝。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³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契丹人认为自己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并称“辽之先，出自炎帝”。⁴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华先祖的认同，从精神层面上确认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古代大多数少数民族无论在分治时期还是统一时期，都自认为是中国人。

（二）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促成各民族大一统意识的形成。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理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政治观、思想观和民族观。天下观是“大一统”理念的地理观，华夷一统则是“大一统”理念的民族观。“大一统”理念不仅是汉民族的共同理念，而且是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共同理念。它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历史上各民族的政治精英，均以“大一统”作为建国和治国的目标，皆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在分治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谋求统一九州。中国历五千年而保持完整和统一，与各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理念密切相关。

“大一统”理念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被少数民族政治精英接受，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大一统”理念中的“华夷一统”或“华夷一体”观。“华”与“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时可以变换的。因此“大一统”理念很容易为汉代以后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建国和治国政治理念。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是民族大迁徙、大互动、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互动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强化了“华夷一体”和“华夷一统”的意识。迁居中原后的边疆民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原人的交流、互动和融合，取长补短，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逐步趋同。北方地区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并以“大一统”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建立“天下一统”的王朝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例如，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石勒（羯人）、前秦的皇帝苻坚（氐人）等都自称“中国皇帝”，以统一中国为己任。苻坚经过20多年的精心治理和征伐，统一了中国北方，国富兵强，只剩下地处东南一角的东晋尚未征服，苻坚

¹ 《魏书·帝纪一》。

²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六》。

³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⁴ 《辽史·太祖纪下》。

⁵ 何星亮：《“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耿耿于怀，认为“不建大同之业”，“天下何由一轨”？¹公元379年，前秦攻克了东晋的襄阳，俘虏了守将朱序。苻坚认为夺取东晋、统一天下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伐晋，以求统一中国。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说明大一统理念少数民族政治精英中根深蒂固。

宋、辽、金、西夏时期，大一统的地理空间不复存在，但大一统的意识和观念仍存在于各民族中。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但他们认同中国，认同中原主流文化，并采用中原汉人的政治制度与礼俗，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辽朝统治者认同中华，并以“中国”自居，把当时的辽宋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辽朝自称“北朝”，称宋朝为“南朝”。辽朝统治者还随时准备消灭宋朝，统一全国。辽之后的金朝亦以大一统作为建国理念，并以中华正统自居。金朝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完颜亶（1119年2月28日—1150年1月9日）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²试图征服其他王朝政权，建立真正的“大一统”王朝。海陵王完颜亮崇尚汉文化，并大力推广汉化，加强中央集权，强化金王朝本身的华夏正统性，他曾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³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意图统一华夏，发大军南征宋朝。

喀喇汗王朝是10~13世纪古代回鹘人及其他民族在今新疆喀什、和田等地区建立的王朝，也是古代西域建立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王朝内的知识精英们认同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例如，公元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把当时的中国分成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上秦为中国东部，即宋朝；中秦为契丹，即辽朝；下秦为喀喇汗王朝。⁴该词典的作者马赫木德喀什噶尔把喀喇汗王朝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也说明西域古代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大一统政治观和大一统地理观。这种政治理论说明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存在古代的“大一统”理念，并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⁵

（三）古代民族分类和认同方式促成各民族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元朝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建立的少数民族全国性政权，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元朝统治者十分注重以主流价值观作为凝聚全国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核心理念。公元1260年，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即皇帝位后，尊崇儒学，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发布《中统建元诏》，建年号“中统”，明确宣布新政权采用中原王朝的传统政治制度。⁶1264年，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1271年，忽必烈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元”，取《易经》“乾元”之义。⁷忽必烈以此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不是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此外，元朝统治者继承奉行“思想一统”的大一统观，尊崇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秋，新即位的元武宗海山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表明元朝对孔子的尊崇超越了唐、宋两代。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二个全国性中央王朝是清朝。清朝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于康熙年间基本完成，至乾隆年间，康乾盛世形成，并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清王朝不仅继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而且以中原主流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尊崇儒家思想、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顺治二年，清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⁸清王朝发展了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文化，强

¹ 《晋书·苻坚下》卷一百一十四。

² 《金史·熙宗纪》卷四。

³ 《金史·擢碗温敦思忠传》卷八十四。

⁴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第479页。

⁵ 何星亮：《“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⁶ 《元史》卷4《世祖纪一》：“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⁷ 《元史》卷4《世祖纪一》：“朕获纁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

⁸ 清《皇朝通典》卷四十八。



化了“华夷一体”意识。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民族分类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缘和种族，民族认同的特点是变异性。这种分类和认同的方式不仅促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成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强化了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国的认同，而且促使各民族为长期保持大一统的中国而努力。

【论 文】

民族平等与群体优惠政策¹

马 戎

摘要：如何坚持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并解读“民族/族群平等”这一普世性原则，是当今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主要议题。对国内的弱势种族/族群实行群体优惠政策，这是当今许多国家用以协调族群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常用方法。自 1949 年建国以来，我国也在一些领域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在这些政策实施 60 多年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要求对这些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的呼吁。本文试图对相关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国人在今后的民族问题讨论中集思广益、逐步达成共识，并在中华各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中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各族群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民族平等，优惠政策，团体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种族冲突与族群矛盾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近年来中国的族群问题越来越受到全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关注。其中，族群平等和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逐渐成为讨论焦点之一。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民族/族群平等”这个普遍接受的普世性原则？应当如何分析政府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种优惠政策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应当如何看待这些优惠政策的社会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中国的民族优惠政策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施，在 80 年代进一步强化，这些政策在今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在实践中带来了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今后这些优惠政策是应当继续强化，还是应当根据各地实际效果逐步进行调整？应当如何思考和确定政策调整的方向？作为主流群体的汉族和从这些优惠政策中受益的少数民族，各自应当如何评价和思考这些政策的发展前景？

当我们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时，有四点需要注意。一是这些政策设计涉及抽象的政治原理，涉及“公平”、“平等”、“多元主义”这些核心概念，相关的理论探索是研究的基础；二是对这些政策进行评价时，必须以社会各界民众对这些政策的实际感受为基础，不能从“经典”或文件出发，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政策的受惠群体和非受惠群体可能有不同感受；三是各族群都存在“人口代际更替”的自然现象，政策最初设计和实施时各族民众对这些政策的态度与感受，很可能与 20 年、40 年后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态度与感受不一样；四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每项政策的预期效果可能随社会制度的转型和演进而出现变化。在政策设计时就可能存在“短期效果”和“长远效果”两种不同考量，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辩证的关系，即政策的近期效果有可能与远期效果存在冲突。如果只考虑眼前效果如通过加大优惠力度来换取部分

¹ 本文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